

苏姓文化

上海苏氏联谊会
中华苏姓文化研究会
网址:blog.sina.com.cn/shanghaisushi
ISBN:962-450-837-2/D44742

主办 上海奇特园林景观营造有限公司
中国景观研究院 协办

报名题字:苏荣秀 2011年3月 第15期



今年2月16日，是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于2月19日刊发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长篇纪念文章《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全面评价了华国锋同志的光辉一生：“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华国锋同志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奉献了毕生精力。”

《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华国锋同志的文章，共分四大部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在湖南工作，“文革”期间参与和领导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领导粉碎“四人帮”而掀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一页诸方面，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华国锋同志做出的巨大贡献。这是继华国锋2008年逝世中央印发华国锋生平事迹后，又一篇高度评价华国锋功绩的文章，意义深远。

《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主要是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及之前的历史功绩作了肯定评价，而2011年第2期《炎黄春秋》杂志发表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写的长篇文章《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则侧重论述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和以后

的表现。作者以史学家负责任的态度，通过五个方面，用大量的具体的事实和史料，令人信服的驳斥了有悖历史的对华国锋“一正四负”的评价。此文较长，在此不能详述，但值得一读，为此本报第15期作了转载，供大家参阅。岁月会像流水一般冲刷掉

那些不实之词，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从这两篇文章中看到了一些历史真相，更具体感受到华国锋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杰出贡献，更加崇敬他那光明磊落的高尚品格和风范！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华国锋本来姓苏，单名铸。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毅然投身抗日爱国运动，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和中国共产党。为表达做中华民

族抗日救国先锋的决心，他于1938年改名华国锋，开始了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他曾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

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1981年华国锋辞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后，继续当选中央委员，关心社会主义事业。退下来以后，他身边的人和友人都习惯称他为“华老”，他感到很自然；也有人称他为“华主席”，他反倒觉得不自在。他愿意做人民大众中普通的一员，即使逝世后也要将骨灰送回故乡安葬，和家乡的山山水水在一起。

苏兴良

高风亮节

苏荣秀题

会刊《金秋》通讯转载，让更多人了解华国锋的原名是苏铸，以及华老的有关信息。

华老的两幅题字的金字匾现今已高悬在陕西武功苏武纪念馆的大殿上。2008年8月20日华老病逝后，中央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并在生平介绍中给予高度的评价。上海苏氏联谊会会长苏永祁宗长立即给苏华发唁电，代表上海苏氏宗亲对华老逝世表示沉痛的悼念；当月编印的《上海苏氏联谊会简讯》第5期中也刊发《华国锋老宗长，我们怀



念您》一文，深切表达我们的哀悼之情。

今年是华老90周年诞辰，为表达我们对华老的崇敬怀念之情，本期会刊增幅转载了《人民日报》等报刊有关纪念华老的文章，以飨读者。

华国锋（苏铸）老宗长的崇高品格和对他国家事业的巨大贡献，将永载史册！

上海苏氏联谊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

苏焱

苏汝谦宗长对苏姓文化的伟大奉献

北京 管成学

看了苏胜辉理事长和苏金丰秘书长主编的《世苏总会第八届大会特刊》所载的苏汝谦《世苏会筹备及联络概况》一文，十分感动。愿把我所知道的苏汝谦宗长对世苏总会和苏姓文化的伟大贡献写给各位苏姓宗长，以便学习先贤，激励后辈，发扬苏姓伟大的奉献精神。

我与苏汝谦宗长相识于1991年8月在长春召开的第二届苏颂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由于苏克福宗长的引见，苏汝谦宗长携夫人来长春参加会议。从此，他们成为了吉

林省、长春市两级政府的诤友（诤友一词是苏汝谦先生生前所用）。

一、举办四次苏颂国际学术会议和捐款善举

苏汝谦与苏克福两位宗长和长春苏颂学术研究会、长春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联合在吉林省和长春市举办了四届苏颂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专著12部，论文150余篇，得到了吉林省和长春市两级政府的全力支持。

苏汝谦和苏克福宗长向长春市体育馆修建工程和长春电影节捐款，至今长春南岭体育馆前的石碑上还刻有他们捐款的名字；他们在长春中医药大学开设苏颂中医

门诊部；在长春中医药大学和白求恩医科大学设立奖学金，是苏姓捐资助学的善举，在吉林省各大学中传扬。

二、资助《新编苏氏大族谱》

苏汝谦宗长像苏用发理事长一样具有远见卓识，他们都认为编写新的苏氏大族谱对广大苏姓宗亲具有巨大的凝聚力，是传给子孙后代的千古不朽的文化遗产。

1991年8月15日，我第一次与苏汝谦见面，他就向我和颜中其教授咨询编写族谱一事。1991年10月，我将能查找到的国内外苏氏族谱目录邮寄给他们，并收入了我与杨荣垓、苏克福编写的《苏颂与<新仪象法要>研究》一书。

1992年8月，第三届苏颂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春市召开。

(下转第2版)



成立于07年5月的上海苏氏联谊会，于2010年11月27日召开了本年度会员大会。参加本次大会的苏姓宗亲有近60位，自上海的四面八方齐聚一堂，场面盛大。这天风和日丽，大家先到寿梁宗长的上海奇特园林景观营造有限公司集合，待人员到齐后就一同乘坐安排好的大巴赶赴主会场——沈湖生态农庄。这是一座位于浦东新区航头镇牌楼村的占地300亩的世外桃源。寿梁宗长的老家是浙江嵊州沈湖村，以此命名体现了他不忘家乡养育之恩的感人情怀。农庄内除了鱼塘、菜园外，还有高级会所、度假别墅、漂流设施以及展现低碳环保理念的风力发电、循环地暖、太阳能取暖等。

大会是在农庄里的礼堂式餐厅“苏园”正式召开的。先由东道主寿梁庄主致欢迎辞。主持人兴良常务副会长一一介绍到场的各位来宾，他们中有年过八旬的高级工程师，身着军装的离休老干部，事业有成的女企业家和年轻有为的生力军。这次出席会议的宗亲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第一次参加苏氏联谊活动，有些是夫妻同行，也有父子、兄弟一起来的，很好地诠释了苏家活动就如同家庭活动，苏家人就如同家里人一样亲切、关怀。之后是永祁会长的精彩发言，概括了今年本会的工作情况并介绍了巴厘岛世苏大会的主要特色。

寿梁宗长为此次会员大会作了周到的安排、细心的准备，租旅游大巴将各位宗亲接到他的农庄，欢聚一堂。大家一同观看了寿梁宗长公司设计的后滩公园获得美国景观行业“奥斯卡”大奖的新闻之

后，兴良教授、瑞常宗长和首次参加活动的德安宗长趁饭前空余时间分别为大家演唱了精彩的歌曲，瑞常宗长还特意为本次大会赋诗一首，受到热烈欢迎。向大家分发的《苏姓文化报》、《七届世苏活动资料选编》、《世苏武功通讯》、《苏氏书画艺术报》和《小水石居文集》，也很受大家的喜爱。

为表达对寿梁庄主盛情支持的感谢，本会分别献上了苏成宗长的《双虎图》和苏焱的《富贵牡丹图》，永祁会长还亲自为他翻印了《绍邑德政乡苏氏家谱》。寿梁宗长很感动，还说明天他将站在首都人民大会堂接受世博贡献奖，这是苏家人的荣誉，他愿与大家分享这份光荣和喜悦。用餐后他将在参加完一个会议后赶赴北京，我看到他身着的西装上还佩戴着此次巴厘岛的纪念品——八届世苏纪念章。

用餐过程中由永祁会长提议，新聘苏文宗长为顾问，聘任原宗长、苏渊宗长、大钧宗长、祖英宗长、小萍宗长、其兴宗长为理事，大家热烈鼓掌通过。相信他们的加入将为我会注入新的力量。

在享用完寿梁庄主为大家准备的农家菜之后，所有人游览了整个农庄，参观了世博动力艇和飞船，并一起合影留念，记录下这一美好时刻。相聚时光总嫌短暂，但苏家精神却会常驻人们心中。

苏永祁、苏寿梁向苏中武、苏泰祥老宗长拜年

本报讯：在辛卯年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苏永祁会长、苏寿梁副会长、苏泰祥老先生府上，代表上海苏氏联谊会向这两位年逾九旬、德高望重的顾问拜年，送上鲜花和由上海奇特农家乐果蔬基地生产的无公害绿色蔬菜，致以节日的祝贺，衷心感谢老宗长对本会工作的热情支持，祝他们春节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阖府安康！



前排左二为苏中武教授，左一为苏永祁会长，左三为苏寿梁副会长。后排左二为苏元善（中武教授之子）、左三为苏元荣（中武教授之女）。



中为苏泰祥老先生

本报讯：正当我们将春节前向苏中武老宗长拜年的合影在头版编辑的时候，惊接讣告，中武宗长于3月9日在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4岁。中武先生1917年4月5日生，浙江平阳（祖居地今属苍南）人，第二军医大学生药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文职特级，科技一级，终身教授，享受国家特殊津贴，总后勤部授予“科学技术一代名师”称号。他德高望重，是上海苏氏联谊会的创始人、顾问，曾热情支持家乡编修家谱，捐资整修武功苏武墓和修缮地震遭灾后的眉山三苏祠。我们向敬爱的中武老宗长表示沉痛哀悼和深切缅怀！

[河北泊头]苏氏族谱简介

苏永祁

2010年6月21日,我收到河北沧州书画院苏超院长快递送来[河北泊头]五修苏氏族谱1套7册。此谱由泊头市寺门村镇绘彩于村苏致瑞先生主修。1998年冬始,2004年夏竣工,铅印线装。分为序、浩命、传略、世系图等。序有五篇;清乾隆年间(1753)第十世祖苏兰成首修的序;笔者注;惜来件序文缺11-16页,恐系装订所漏,首修、二修两序不见全文又无法衔接),嘉庆十九年(1815)八月第十一世苏德润二修时撰的序,同治元年岁次壬戌(1862)仲冬第十二世苏元徵三修时撰的《重修族谱弁言》,民国辛未(1931)十二月第十三世苏钟芹四修时撰的序,2004年4月10日第十七世苏致瑞撰的《五修续族谱序》。

苏致瑞先生秉承父亲临终遗嘱,在花甲之年,日踏人力车数十里,四处寻访,联络族人,历时6年并捐资万元,完成了续修工程。他在序文说:“吾始祖字伯先,由直隶东安县(今河北省廊坊市)苏大人

营庄,迁居山左济南府阳信县神安店,明永乐(1404)迁交河县东四家屯(四家屯后改称苏公屯)。吾始祖兄弟四人,始祖长,字伯先,二弟字仲先(山东省乐陵黄夹店始祖),三弟字叔先,四字季先。据记载,始祖留三弟在东安县苏大人营庄,守祖业祖墓,携二弟、四弟南徙,抵山左乐陵城西黄夹店,安置好二弟后,又携四弟东抵阳信神安店。在明洪武大姓实徵辅,始祖兄弟背井离乡,又不能节日祖墓,尽孝拜祭,借迁大姓津南之机,为之距故乡较近与兄弟洒泪而别,离山左北抵交河县四家屯居(今河北省泊头市苏公屯)。四弟季公因性情豁达喜游,去了山东半岛即墨崂山定居。”

致瑞先生于2003年3月,赴山东乐陵黄夹店考查,通过与当地族人座谈查阅族序,确认泊头始祖与乐陵始祖是兄弟,并把乐陵苏氏族谱五修序,录刊于泊头五修谱内。2002年4月他曾去廊坊市(直隶东安县改称安次县),后又改称廊坊市,有安次

区),未查到苏大人营庄。到苏姓大户聚居的廊坊市落垡乡苏庄村,见到苏庄村苏氏族谱世系图,始祖讳吉云,没有对上谱系。

据1996年乐陵22世孙苏安仁撰的《乐陵苏氏族谱五修序言》:乐陵苏氏,自明永乐二年(1404)始祖仲先公迁来乐陵黄夹镇居住,至民国17年(1928),其间520余年,曾修谱四次。乐陵始祖来自直隶省东安县(今河北省安次),而东安苏姓出自四川眉山三学士。苏洵次子辙公致仕筑室安家在许州(今河南许昌)。元时,是辙公某代孙某公,身膺武官,北驻东安,其住地名曰苏大人营,故东安苏姓出自许州。我乐陵传统对联:“眉山新事业,许州旧家声”,也说明乐陵苏氏为眉山洵公后裔,辙祖枝。我始祖在东安南迁时,为兄弟四人。当时留三弟叔先公守祖业,伯、仲、季三兄弟一同南来,我始祖定居乐陵黄夹镇(当时称千童乡黄夹店),长兄伯先公后来定居交河泊头,四弟季先公好游,后定居即墨崂山。故乐陵、泊头、崂山苏姓与东安部分苏姓为并列四枝。

又据《乐陵苏氏始祖仲先公传略》:始祖仲先讳蕃,原籍直隶东安县,庄曰苏大人营,先世武职得其名焉。公昆季四人,长讳盛字伯先,三失讳字叔先,四讳昌字季先,我始祖其次也。

原貌。民国时期作为糖市,牛墟,日渐荒废。解放初期,漳州浦头浸水埕石田堂苏龙宝和田中央崇德堂苏炎坤二位族老,将道公神像和神牌移奉至石田堂。2010年,漳州浦头浸水埕石田堂重新修建,使大宗祠堂焕然一新,并重塑开漳始祖道公神像于大堂左侧。

在龙海太江村,我还收集到一篇写于民国三年的道公祭文。全文如下:
漳州北庙祭开漳始祖道公祝文
主祭裔孙 等,谨以羊首牲醴,庶羞粢盛,果品香楮。

(下转第6、7版中缝)

读报偶得(三)

它有千年历史,是大名鼎鼎的“仙鹤之乡”。

松江古称华亭,成县于唐代天宝十年(751年),划昆山南境、嘉兴东境、海盐北境而置。其时三面环海,有大片滩涂、湿地、芦苇荡,是仙鹤的乐园。位于海滨的鹤窠村,早已闻名遐迩。三国东吴儒将陆逊获封华亭侯,华亭首次作为地名见诸史籍,他早年曾养鹤于华亭鹤窠村。其孙东晋名士陆机、陆云亦喜鹤、养鹤。陆机含冤被害临刑时悲叹“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梅尧臣的《过华亭》诗,均有华亭鹤的记载。成书于南宋的《云间志》有“县之东,地名鹤窠”,“云间,唳鹤之乡”的记载。清代著作有“鹤窠,即今之下沙也。”“仙禽产自下沙乡,……鹤窠村里鹤坡塘。”《南汇县志》记载,“下沙镇又名鹤沙镇,是本县古集镇之一,相传这一带原为盛产丹顶鹤的鹤窠村所在地。”原先的南汇县下沙镇,现已归属浦东新区航头镇;航头镇牌楼村十三组,就是下沙(鹤沙)古镇的策源地,也即旧时鹤窠村,其西端有条长着芦苇

沙镇,是本县古集镇之一,相传这一带原为盛产丹顶鹤的鹤窠村所在地。”原先的南汇县下沙镇,现已归属浦东新区航头镇;航头镇牌楼村十三组,就是下沙(鹤沙)古镇的策源地,也即旧时鹤窠村,其西端有条长着芦苇

的“鹤窠”。当地至今流传着陆逊在鹤坡塘边逗鹤的生动故事。

《人民政协报》2011年1月6日发表苏荣(海军上海基地原副司令员)将军的《接待美国退役海军上将里科费来访》,文章回顾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12月,美国海军顾问、美国核潜艇之父,80岁的海军退休上将里科费,应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来华访问,先在北京等地参观访问后于1983年1月1日到达上海,苏荣受命负责接待取得圆满成功的情景。全文3000余字分为紧急受命确定方针、陪同参观随机应变、抓住时机促成会谈三个部分,写得生动翔实,既是一份军事外交的经验总结,又是一件宝贵的海军史料。

由上海政协主办的《联合时报》2011年2月15日以第三版“委员风采”整版篇幅,发表邵鹏琛所写对86岁高龄的苏荣将军的长篇报道《苏荣:毕生只为做好每件事》,生动介绍了苏荣将军的革命经历及其毕生工作的理念和追求。

苏荣将军,江苏省东台人,1925年2月生,1942年2月参加革命,1944年2月入伍,为新四军苏中公学第一期学员,1944年12月入党。1961年毕业于海军学院指挥系。历任参谋、秘书、海军东海舰队司令部两任办公室主任、军委海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海军上海基地副司令员、纪委专职副书记等职。1988年7月离休,曾参加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追击、解放上海等战役,以及抗美援朝东线的第二、第五次战役。在1956年6月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接待外国军舰、前苏联访华舰队访问上海时,他任东海舰队办公室主任,作为海军代表参与了接待办公室的主要工作,从此积累了丰富的海军军事外交经验。

▲苏双碧、苏海南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中共中央主办的《求是》杂志于2011年第2期,刊发了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苏海南的文章《“提低控高”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苏双碧的文章《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教训》。

▲苏维民著《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上海出版的《党史信息报》周刊2011年1月19日第969期起连载。苏维民,男,中共党员,1949年3月参加工作,1954年7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办公室秘书,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回到中央办公厅工作,1994年离休。离休后参加了《杨尚昆回忆录》、《杨尚昆日记》和《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等书的编辑工作。2010年第10期《百年潮》杂志刊出苏维民长文《在杨尚昆身边工作见闻》。

▲由程十发艺术馆主办的苏渊雷、苏春生海上二苏华亭展1月28日开展,画展将持续两个月至3月28日。上海苏氏联谊会副会长、中国景观研究院苏寿梁院长作为嘉宾参加开幕式剪彩。本会出席开幕式的还有苏麟昌夫妇及苏焱。

▲苏荣、苏志武在《求是》2011年第4期发表文章。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苏荣的文章是《树立积极的稳定观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稳定》。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苏志武的文章是《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春节前,苏康宗亲告诉苏永祁,《苏姓文化》第14期所载镇江史志办所藏《润东当江苏家桥苏氏族谱》,正是他老家(丹徒圌山村全姓苏)的,上面有他曾祖父的名字,乃苏颂之子苏京的后裔。排行中士字辈的他原名苏士康。苏永祁前年寻访润州苏颂父子遗踪时曾撰文盼望镇江出现苏颂子孙,现在终于从结识多年又在沪工作的苏康宗亲身上得到了实现。

编辑委员会

主编:

苏兴良 苏永祁

副主编:

苏寿梁 苏智良 苏 涣

编 委:

苏德洋 苏颂兴 苏 涣

苏瑞常 苏慧娥 苏春生

苏盛余 苏建勇 倪建华

陈 或

编辑部地址:

200433 上海国定路505

弄22号302室 苏兴良

邮 箱:

suxingliang@online.sh.cn

13816523221@139.com

鸣谢

苏伟庆捐会费 10000 元

苏文陈凤捐会费 1000 元

苏泰祥捐会费 1000 元

苏小萍捐会费 300 元

苏佩之捐会费 300 元

苏化原捐会费 300 元

海宁召开纪念苏元复、沈鼎山百年诞辰座谈会

年前,浙江海宁召开纪念化学工程学家苏元复、沈鼎山百年诞辰座谈会。市有关部门领导及各地学者出席了座谈会。苏元复院士的女儿苏克曼教授在座谈会上作了发言。

苏元复院士出身于浙江海宁郭店的海宁名门苏氏世家。其祖父苏钟岳于民国初年担任郭周乡议长期间,创办了郭周乡小学堂,开海宁乡镇近代意义上学校之先河。其父苏宗轼专攻法律,先后担任杭州市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及吉林高等法院、天津高等法院法官。1910年出生的苏元复院士就是在其祖父创办的学校接受启蒙教育的。

苏元复先生一生勤奋好学,14岁时考入杭州蕙兰中学,23岁大学毕业,于1935年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进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工学院专攻人造丝,1937年获硕士学位。后去瑞典及爱沙尼亚工作实习。期间,他掌握了制造硝酸和硝化甘油的技术关键,并绘制了近百幅图表,详细记录了操作规程,为回国后从事国防化工工作奠定了基础。

上海解放前夕,苏元复先生发动并带领交通大学化学、化工两系师生转移并保存了大量仪器设备。1952年国家筹建华东化工学院,他是负责人之一,历任学院教授到教务长、副院长、化学工程研究所所长和顾问。苏元复院士热心国内外各种学术活动,他一生著(译)作颇丰。1951年,与他人合译了《化工原理》上、下册,被全国各大学有关专业普遍采用;他所拟定的各种化学术语为学术界所公认,一直沿用至今。1979年他又审定了全国统编教材《化学工程》一、二册。可以说,他是我国大学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1980年11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4年被选为国际溶剂萃取委员会委员。其地位和贡献享誉海内外。

苏元复先生是海宁市籍为数不多的院士之一,他是我海宁苏姓族人的骄傲,也是海宁的骄傲。斯人已逝,其风范和精神永存。

苏姓人闽开漳史料

福建漳州 苏登科

一、苏道略传

苏道是苏姓入闽开漳始祖。

西汉时期,在今福建泉州至广东潮汕地区之间还分布着众多的闽越族后裔。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这些在当时被称为“蛮獠”的少数民族,发生“啸聚”叛乱。朝廷命左郎将陈政为岭南行军总管,从中原统军南下,历经40年才将他们平定下去。这次平乱,先有陈政所率府兵3600人,将校132名;后有陈元光随军眷属、后勤人员、商人、平民百姓,其人数超过两万人。这些人后来都定居下来,范围包括今福建漳州、泉州、龙岩、广东潮汕地区在内。

唐初中原移民入闽这一历史事件,均记载在《福建通志》、《广东通志》、《漳州府志》、《泉州府志》、《漳浦县志》、《云霄厅志》、《潮州府志》、《揭阳县志》等书。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远远大于历次中原移民入闽。这次移民有三大特点:一是唯一一次由朝廷组织进行的大规模移民;二是目标明确,直接到达泉潮地区平乱,并且明确到达目的地后就地安家,作长期扎根准备;三是时间长,陈氏家族连续治理150多年。由于数代人在这一地区开发建设,兴办学校,移风易俗,从而使该地区成为唐代安定繁荣的区域。同时,闽南作为中原民众南下的目的地,唐末王潮的再次入闽,也是以第一次入闽为基础的。史学界早有定论,闽南民系的形成,闽南方言之流布,均与唐初入闽这一事件紧密相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次入闽,两批共有64个姓氏,连同随军入闽开漳眷姓氏共有87姓,形成众多的漳州姓氏开基祖。我们苏姓也在其中。记载在《漳州府志》兵纪卷里,也是唯一一个姓苏的,就叫作苏道。他是陈政、陈元光132名将校当中的一员。苏道,入闽时为府兵队正。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年),授封昭德将军,附祀陈圣王庙。这是

(上接第1版)苏克福、苏荣华理事长率领

的台湾苏氏代表团,苏汝谦率领的香港苏氏代表团、苏岳章、苏健民率领的泰国苏氏代表团等到会。苏汝谦在会上,把8万

美金交给我和颜中其教授,做为《新编苏氏族谱》的启动费用。我和颜中其教授分别到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图书馆复印了十几部国内的《苏氏族谱》。

1993年夏天,苏汝谦提出我与颜中其教授赴日本和美国收集《苏氏族谱》,把流失日本和美国,国内不存的《苏氏族谱》引回国内。这样,才有了我与颜老的美国、日本之行。

1993年8月2日至16日我与颜老赴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国会图书馆,引回了流失日本的《苏氏族谱》。1993年11月9日,苏汝谦联系好了美国苏姓宗亲会理事长苏日成先生,我们飞往美国旧金山。

我们临行前,苏汝谦交给我们两封信,一封是给美国的苏日成理事长,一封是给加拿大苏姓宗亲会理事长苏成坤,他仍在为成立世界苏姓宗亲总会操劳。苏日成先生以84岁高龄亲自驾车陪我们收集族谱和游览名胜古迹。

现在苏日成和苏成坤两位理事长都已辞世,我的这篇文章也算对苏姓老一辈理事长的悼念和追思吧!

三、投资长春苏姓商业城

苏汝谦和苏克福先生很快成为吉林省和长春市领导的诤友。他们和颜老主编

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使诸多“只闻其名,不见其形”的名家巨作“回归”大陆,出生在台湾高雄后随夫旅居新加坡18年的苏绣女士,将二玄社复制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书画引进内地,并于96年在上海创办了“大雅堂”文化艺术公司。此次正值“大雅堂”在上海假座刘海粟美术馆举办“故宫珍藏”经典书画复制品展,笔者日前去展馆欣赏到了这些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书画珍品,包括有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及宋代画家苏汉臣的《秋庭戏婴图》。这些作品虽是复制,但却按原色原幅大小复制在特制纸绢之上,真实地展现出原作笔墨的微妙变化,实在令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

苏绣女士还曾率队在全国七十多个城市的权威艺术机构举办了近百场展览,好评如潮,掀起了艺术品复制热潮,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行业,而“大雅堂”被公认为中国书画复制艺术的第一品牌,入选2007中国创意产业100强。众多艺术爱好者因此走上了复制经典艺术品、弘扬文化艺术之路。国内的艺术家及书画爱好者也再不必大费周章、长途跋涉地寻访原作所在博物馆,只需走进“大



左三为苏绣女士

热烈祝贺上海苏氏宗亲在2010年获得殊荣

★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空中花园荣获世界屋顶花园500佳,项目总协调苏寿梁荣获世界屋顶花园绿化杰出人物金奖,并于2010年11月28日在北京钓鱼台出席了表彰会。

★ 上海世博会后滩花园由上海奇特园林景观营造有限公司设计营造,荣获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授予的“综合景观设计杰出贡献奖”,苏寿梁总经理于2010年9月应邀赴华盛顿领奖。

★ 上海中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德科于2010年5月10日当选嵊州上海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会第二届理事会会长。

★ 苏正康任总经理的上海周康房地产有限公司,继2009年度之后又荣获“2010年度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之“优秀公司”。

★ 本会常务副会长、复旦大学苏兴良教授荣获复旦大学2010年度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之“金秋风采人物”。

★ 本会理事、复旦大学老干部处原处长苏咏絮荣获复旦大学2010年度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之“特殊贡

献奖”。

★ 第二军医大学药理学教研室主任苏定冯教授荣获2010年“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他领导的药理学课程教学团队荣获“上海市级教学团队”;药理学教研室获二军大基层建设标兵单位,荣立集体三等功。

★ 据《第二军医大学年鉴(2010)》:长海医院骨科主治医师苏佳灿荣获外训教学先进个人,“精品课件”作者、优秀共产党员,荣立三等功;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病毒治疗研究室副研究员苏长清获总后勤部通令表彰的先进个人,荣立三等功;中医系方剂教研室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苏永华获全军表彰的先进个人、军队院校育才奖“银奖”、上海市高校“育才奖”;基础部苏娟、苏彤获校级教学先进个人;苏文山参与的《军队体育教学创新与实践》获军队教学成果二等奖。

★ 苏一飞总经理的上海高亚建筑设计事务所的设计项目,2010年10月荣获中国建筑学会人居经典设计大赛规划与环境双金奖。

活跃在上海的苏姓人士(六)

苏锦英(女):上海大不同天山茶城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福建福安人。

苏其兴:上海深井泵厂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南安人,1971年生。

苏荣和:上海苏置郡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建湖人,1963年生。

苏伟:上海麦杨派讯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南汇人,1981年生。

苏以新:苏元复院士三公子,机械工程师,浙江海宁人,1942年生。

苏永梦:花木文化服务站有线电视工作者,上海南汇人,1957年生。

苏德安:原上海硫酸厂工程师,祖籍浙江宁波,1942年生。

苏苗杰:上海凯信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苍南人,1959年生。

苏学兰(女):杨浦区第四干休所军休干部。

苏鄂生:上海越剧院团长、二级编剧,江苏江阴人,1938年4月生。

苏海浪(女):静安区教育局原幼教科科长,上海师范大学毕业,1954年生于上海,祖籍安徽铜山。

苏丹(女):上海MarryMade策划公司董事长,1969年生于上海。

苏勇:香港得理电子(上海)有限公司音乐部

经理,祖籍安徽和县,1975年生。

苏国彬:上海富地阀门有限公司销售部副经理,福建安溪人,1981年生。

苏佳音:中石化高桥分公司工程师,上海宝山人,1983年生。

苏德志:上海宇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销售工程师,湖南岳阳人,1985年生。

苏佳灿: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苏励:上海龙华医院风湿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贵华: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脑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苏青:上海市新华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副教授,1967年8月生。

苏晖: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总部)精神科副主任医师。

苏静:女,上海中国人民解放军411医院妇科医师。

苏晓:女,上海市中医医院风湿科主任医师。

苏永庆:上海市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教授。

苏怡:女,五官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

苏伟庆:上海圣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1946年7月生于上海,祖籍无锡。

迎接“杰展印务”的春天

—访苏萧涵宗长

苏兴良 苏焱

阳春三月,虽暖乍寒,已到了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时节,松江大地也呈现一派生机。我们来到地处松江区洞泾镇张泾路595号的上海杰展印务有限公司,采访了该公司的总经理苏萧涵(中善)宗长。萧涵总经理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又因同是苏氏宗亲,相见显得格外亲切,敞开胸怀,畅谈了一个上午,让我们满载而归。

记得去年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曾来萧涵总经理这里的公司参观,因受世界经济低迷的影响,公司的业务还不能全员开工生产。今年的生产情况则大不同,公司的设备已全部开足马力,还远远不能满足客户需求,于是再向日本进口两部不干胶彩印机,以扩大生产规模。

萧涵总经理首先带领我们参观了公司的生产车间和库房。车间里一派热气腾腾的忙碌生产景象,不干胶彩印机在飞快地运转,员工们或是操作机器,或是仔细检验产品质量,或是搬运成品,忙得他们都来不及跟总经理打招呼,只见一卷卷、一条条彩色商标从流水线上流过、卷起、装包。在库房,我们看到货架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商标制品、号码贴纸、包装盒等产品,真是五彩纷呈,看得我们眼花缭乱。

参观结束后,我们来到萧涵总经理的办公室,听他关于公司情况的介绍:公司自成立以来,生产规模不断发展扩大,除了引进了当前日本最先进的轮转印刷机,还拥有磨切机、验标机、分切机、晒版机等先进设备,并提供图案设计、色彩选择等技术。目前公司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不干胶印刷技术人员团队,能够印制各类卷筒商标:铜板不干胶、镭射激光商标、静电膜商标、PVC和PET膜类、内膜类、金箔和铝箔商标,以及各类连续号码贴纸、自动贴卷式商标、塑料复合软包装食品包装产品、服装商标、各种防伪标识,还有为各类高档商品包装盒,诸如药品、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用品等,提供各种影印、彩印、制作服务。

公司经营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更注重企业的内部管理,用新的管理思维,即“人性化”的管理,与员工建立密切关系,每周与技术人员在一起商讨生产业务和技术创新,不断提高福利待遇,给表现优秀的员工增加奖金,年终请全体员工团拜聚餐。公司还为员工提供各种学习机会,并专门为优秀员工制定培训计划,以便努力提高员工的技术水平和操作技能。同

时,公司让每个员工都遵守“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的宗旨和以“客户至上”的原则精神,努力为各类客户提供更佳的服务。全体员工也都以公司为家,这次春节过后,返乡的外地员工都按时返回公司岗位。为适应公司扩大生产业务的需要,公司在网上发布招聘技术人员的广告,广纳人才,以推进印制数字化、网络化进程,并不断开发印刷新技术,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骨干力量。

不知不觉间已到了中午,萧涵总经理请我们到附近饭店一起用餐,边吃边谈。他说,我的老家在温州苍南龙港,跟上海安城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万朋是同宗兄弟。高中毕业后,到乡里做共青团的工作,后来下海办企业,2000年来到上海创业,先到浦东发展,2007年来到松江洞泾百颗星开发区建厂办公。经过几年经营,公司业务有了较大发展,现在厂房不足,正准备将办公室、会议室搬到二楼,留下一楼全部用作生产线车间,安放新添置的机器设备。

他饮了一口茶,继续回答我们采访的问题。他说,现在公司业务很忙,公司办公室里还有两个客户等他谈采购、签合同。自己已到了50岁“知天命”的年纪,有时感到很累,真想外出旅游放松一下,就打算让两个已工作的女儿来帮忙管理公司。但她们都有自己喜爱的工作,不愿意来,我只好继续干下去。谈话间,我们深深感觉到,一种企业家求发展的使命感,促使他欲罢不能,不仅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目前还有更大发展的规划正在实施。这不,他与宗兄苏万朋总经理合作,在奉贤区南桥庄行镇新办“上海创众包装有限公司”,将大规模生产彩印包装制品,以适应市场商业发展的需求。现在有关手续、建厂事宜都在积极进行之中。原来的“杰展印务”要扩展,新的公司要建立,萧涵总经理能不忙吗?于是我们赶紧握手道别,公司会客室里还有两家客户在等着他呢!

春光和煦,我们看到松江这片热土,正在描绘着春天最美的图画,华丽的别墅区密集,洞泾开发区里各类公司厂房相连,9号线地铁穿行其间,昔日远离市区的松江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上海苏氏许多企业家都相中这块宝地,在此办企业建公司。我们祝贺他们事业大发展,前程无量,为上海这座大都市的建设争光添彩!



我公司共揽四项建筑工程“鲁班奖”

上海奇特园林景观营造有限公司 陈或

在世博会闭幕半年之后,2011年3月3日《建筑时报》公布了2010—2011年度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第一批入选工程名单,其中中国景观研究院院长、上海奇特园林景观营造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寿梁所领导承建的世博会项目共获得四个“鲁班奖”: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中国国家馆、中国地区馆)、世博轴地下综合体工程、世博中心、世博村A地块(VIP)生活楼。

“鲁班奖”全称为“建筑工程鲁班奖”,1987年由建筑业联合会设立,1993年移交中国建筑业协会。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建筑施工企业加强管理,搞好工程质量,争创一流工程,推动我国工程质量普遍提高。当时,这项标志着中国建筑业工程质量的最高荣誉,由建设部、中国建筑业协会颁发,是行业性荣誉奖,属于民间性质。1996年7月,根据建设部“两奖合一”的决定,将1981年政府设立并组织实施的“国家优质工程奖”与“建筑工程鲁班奖”合并,奖名定为“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每年评选一次,奖励数额现为每年80个,有严格的评选办法和申报、评审程序,并有严格的评审纪律。评审由评审委员会负责,协会只负责受理申报、组织初评和工程复查,不干预评选工作。评委

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地区的专家组成,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定。
这一次我们公司所承担的世博项目中,在全国每年只有80个“鲁班奖”奖励数额中,竟占有四个,这既是对苏总杰出才干的肯定,也是上海奇特园林景观营造有限公司的集体荣耀。

七律《苏局仙墨迹选》
赏读并谢苏君永祁

北京 倪祖明

文祀来京,遵苏局仙长孙苏永祁先生托,赠我《苏局仙墨迹选》、《苏局仙联语选》。赏读多遍,觉得苏老诗书俱佳,“两株仙桂一样荣”。感而赋诗,并谢苏君永祁。

妙墨瑶章岂易分,琉璃照眼玉缤纷。
古今留迹知多少,百十挥毫惟一人。
气韵鲁公惊笔意,遗风康乐铸清音。
山庄应识东湖好,春草池塘不在深。
庚寅仲冬吟于京华西郊静庐

通 告

上海各位宗长：
辛卯年清明公祭苏武典礼，定于4月13日(星期三)上午在陕西省武功县苏武纪念馆广场隆重举行，由武功县县委、县政府主办，诚邀海内外苏姓宗亲参加。届时陕西省、咸阳市以及世苏的领导都将出席。我们上海苏姓宗亲以前每年都有人热情参与恭祭先祖盛典，此次有意前往者，请尽早告知苏永祁或苏兴良，日程、航班、车次各人自定，我们可帮助与主办方联系，到咸阳机场或西安、咸阳车站后，将由主办方安排接机(站)和食宿。

上海苏氏联谊会
2011年3月8日

悼战友
1995年9月
北京 苏文

巍巍英碑矗星斗，广袤大地雾茫茫。当年鏖战君归去，余生皓首思绪长。枪中无弹无所惧，刺刀拼搏硬脊梁。百年耻雪犹未雪，倭寇缘何今又狂。喜庆时日眉不展，遗忘奠基泉下凉。夜雨秋风寒来早，吟歌一曲伴尚飨。

注：1940年10月23日和1941年2月28日，抗大胶东支队两次被日军偷袭，战斗激烈，伤亡惨重，50多位战友牺牲。1977年秋和1989年夏，作者到胶东大泽山葛门口和招、掖交界的修家沟昔日的战地，追念战友，十分遗憾，在莱州市(掖县)革命烈士陵园的英名录中，竟然查不到有关记载，不禁泪下。今纪念反法西斯和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心情依然沉重。

作者简介

苏文(曾用名舒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原教育司顾问，山东蓬莱人。1923年生，1939年1月参加革命，同年3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政治、法律教育工作。1940年7月至1941年3月，在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支校学习，期间参加对日作战数次。亲手掩埋抗大与日军作战中牺牲的数十名战友。亲身经历1942年12月，日军以两万余兵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惨绝人寰的“拉网大扫荡”，目睹日本侵略军的种种暴行。其兄苏振民，化名李向民，胶东《大众报》编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共党员，于1942年反“扫荡”中被俘，后惨遭日军杀害，作者迄今仍在寻觅其兄遗骨何处。每每忆述往事，国仇家恨历历在目，心情忧郁。其长女苏敏近寄来苏文宗长多首旧作诗词，今选刊其中《悼战友》。

代邮
2011年是苏东坡仙逝常州910周年。本会除广泛组织有关全国第17届苏轼学术研讨会论文外，还欢迎市内外各届人士惠赐以纪念、缅怀苏轼、弘扬东坡文化为内容的诗词、散文、书画、篆刻、工艺美术等作品。本会拟在有关纪念专辑和《苏学通讯》陆续选载。敬请支持，不胜感激。
(联系方式，见征文启事)
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

世苏盛会感怀

苏瑞常

世界苏姓宗亲总会第八届代表大会2010年10月22—24日在印尼巴厘岛隆重举行，来自东南亚各国、美国和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苏姓宗亲代表近千人光临大会，盛况空前，感人至深，遂作诗一首抒怀。

世苏盛会史无先，四海兄弟聚一堂。
畅叙族亲思前贤，焕发精神意气扬。
大会架起金桥梁，代传文化闪光亮。
携手奋进放新彩，宗亲一家喜洋洋。

苏颂研究有感

镇江 蒋立群

学富五车车作栋，才高八斗斗称泉。
恢宏水运仪象转，涵古创新别样天。

编者注：蒋立群先生是镇江市生产力促进中心研究员、市科学技术情报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市收藏协会秘书长，长期关注、研究苏绅、苏颂父子史绩，积极倡议、呼吁镇江市大力宣传苏颂并追寻苏颂父子遗踪。此诗系其旧作。

纪念苏轼仙逝910周年
全国第十七届苏轼学术研讨会
征文启事

为了纪念苏轼仙逝910周年，常州市人民政府、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拟于2011年8月在江苏省常州市共同主办“纪念苏轼仙逝910周年暨全国第十七届苏轼学术研讨会”。现面向国内外征集研讨论文。

一、征文范围
全球从事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苏学研究爱好者。

二、征文内容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苏轼和谐理念与实践”。以下研究选题仅供参考：

1. 苏轼的和谐理念与儒释道
2. 《东坡易传》的和谐思想
3. 苏轼变革主张与社会和谐
4. 苏轼从政实践与和谐理念
5. 苏轼作品中和谐思想评析
6. 苏轼的社
7. 苏轼的家庭和睦之道
8. 苏轼的内心调和之道
9. 苏轼的环保意识
10. 苏轼的生态意识
11. 苏轼的人生追求
12. 苏轼的社会取向
13. 苏轼的人生姿态
14. 苏轼的生命观
15. 苏轼文学作品中的生命情怀
16. 苏轼养生的基本理念
17. 儒释道与苏轼养生
18. 音乐与苏轼养生
19. 美食与苏轼养生
20. 茶、酒与苏轼养生

三、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2011年5月31日截稿。论文请发《苏学通讯》电子邮箱：CZchenbi@126.com或者寄至：江苏省常州市大观路10号（市文联内）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王润收，邮编：213003。

四、征文说明

论文要求有内容提要50—100字和关键词3—5个。在文稿末注明真实姓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或QQ。优秀论文将收入“论文集”，部分作者将邀请参加本届研讨会。

联系电话：
0519-86075567
0519-86683641

全国第十七届苏轼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



深圳苏氏宗亲联谊会在元旦佳节举行第二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理事会，苏潮平任会长，苏国平、苏瑞通、苏绍开、苏广雄为常务副会长，苏师芦为秘书长。第一届理事长苏醒在会上作了首届联谊会工作总结报告，并被选为名誉会长。(图中左为苏潮平会长)



世苏顾问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苏明伉俪、武功县政协主席孙胜利伉俪一行六人于2010年12月30日抵沪。上海苏氏联谊会苏永祁会长夫妇以及联谊会理事苏仕礼、苏焱分别在机场及饭店迎接，并午宴招待。

1日，由苏寿梁副会长安排，苏永祁会长及苏兴良常务副会长陪同一行人由VIP通道进入参观世博中国馆，共同用餐后到火车站送行。由理事苏仕礼连续两天安排并亲自一路接来宾。



▲中华苏姓文化研究会理事、长春作家协会会员、著名苏学专家颜之江先生近日将其诗集《放飞豪情》(长春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邮赠本会与苏永祁会长。

▲据12月11日《大公报》，成立于1985年的香港甲子书学会为庆祝成立25周年，12月10日在香港大会堂举办《论语精选》作品展。共有80位会员的145幅作品参展，为历年之冠。特区政府教育局常任秘书长黄鸿超、甲子书学会名誉会长苏周艳屏及学会会长苏树辉联袂主礼，苏树辉致开幕辞。该会2007年曾合办《道德经》书法作品展，开创了以中国哲理书写作品为展览专题的先例。

▲2010年12月苏永祁向浦东新区图书馆捐赠一批苏姓人士的著作，《苏局仙墨迹选》、《苏局仙联语选》、《苏平行书诗文真迹》、《苏子强书画篆刻集》，苏兴良著《枫林集》、《中日现代文学关系概论》，苏永祁著《小水石居文集·第一册·仰望先祖宗贤》。

▲2010年12月18日，海南省儋州市首届东坡文化节隆重开幕，数万民众聚集市民文化公园怀古颂今，怀念东坡。一台《东坡·九歌》大型晚会拉开以弘扬东坡文化为主题的儋州东坡文化节大幕。19日起，东坡国际论坛、东坡美食品鉴会、赛歌会、书画展、闭幕式等多项内容相继展开。儋州市位于海南省的西北部，是海南省土地面积最大、人口仅次于海口市的西部重镇，是“全国诗词之乡”、“全国楹联之乡”和“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东坡先生谪居儋州3年，为当地的文化、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得到儋州人民的世代敬仰。今后儋州市与广东惠州市、湖北黄冈市，将轮流举办“东坡节”。

▲《新民晚报》《阅读》专版于2011年1月10日—12日连续3天摘刊上海师范大学文史传播学院院长、本会副会长苏智良教授所著《上海黑帮》(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部分内容，取名《旧上海帮会终结》。

▲本会理事苏建勇之子苏邃韬先生与翟巧玲小姐于2011年1月2日举行婚礼，苏永祁会长偕夫人应邀出席席婚宴，代表上海苏氏联谊会表示热烈祝贺，并受新郎新娘及其双方家长的重托，担任证婚人致证婚贺词。苏寿梁副会长派代表苏艳小姐出席祝贺。

**无锡苏茂伦来信
赞苏用发家长**

编者先生：去年12月26日收到贵报编辑部寄来的第14期《苏姓文化》报，读后感触很深，特别是苏用发宗长在“世苏”八届大会上的致辞，尤为感动。在其任七届“世苏”总会长期间能为苏氏带来那么多的实质性的丰硕成果，实令人敬佩。从中足见用发宗长的那份执着的拳拳游子心、殷殷宗族情的情怀和胸襟，故也成就了其任职期间对宗族做出了如此一修功德无量的大礼。要知道这修大礼和丰硕成果都是砸钱得来的，实属不易和难能可贵。如果我们苏氏中能多出几位这样醉心宗族并鼎力亲为的人士，则为我苏氏之幸甚、祖宗之荣光矣。

无锡 苏茂伦 2011.2.22



东坡诗意图(山水画) 苏焱

永祁宗长惠鉴：

近好？《小水石居文集》拜读，受益匪浅，遂抒七律诗一首前几日寄出，想已收到了，谨请教正。

近期整理书信，发现一封信，引起我的联想，现告您，还请您研究苏氏文化中留意一下。

我在1989年9月至1991年6月间，在甘肃联合大学文博考古专业进修。该校有位音乐教师叫苏子仲，对我很好，我结业后还与他通过几封信。1993年10月，他给我写来信，大概讲了他家族的事。他是天津人，祖籍河北，他祖太爷曾是广州巡府。他父亲曾给他讲过他家门上的对联，他还记得：

横批：业振眉山
对联：十八世箕裘迁游渤海
五百年矩业振眉山
门扇斗方联：泽长中水文章世
流远眉山事业源

联中“十八世”是指其祖太爷这一世到苏杭去的这一辈，“游渤海”是指从

上海苏氏联谊会增聘顾问、理事

(2010年11月27日大会通过)

顾问：

苏文：原盐城地委办公室主任，高级农经师，1947年参军的离休干部，江苏建湖人，1932年生。

理事：

苏化原：原航天局八零三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湖南临澧人，1934年生。

苏渊：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教授，儿科主任，江苏常州人，1940年生。

苏小萍(女)：上海申瑞室内装潢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温州人。

苏祖英(女)：上海特多利旅游用品有限公司、上海特吉丽皮具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奉贤人。

苏其兴：上海深井泵厂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南安人，1971年生。

苏大钧：原南汇区政协副秘书长，上海南汇人，画家，1946年生。

甘肃苏裕民来信

眉山到河北。“中水”，是指河北交河县。查辞海知：

交河，旧县名，在河北省中部偏南，南运河和滏阳河之间。1983年撤销，并入泊头市。

他还说：据老人们讲，他们的祖先是：苏龙、苏虎、苏彪、苏凤四兄弟，交河县子孙是苏彪之后。其余不知。因此，我联想起永登苏氏始祖正好是苏龙。子仲宗亲的祖太爷即是苏彪的第十八世孙，到子仲已是21世了，一般一世按30年计，约六百余年。永登始祖苏龙是元末明初从元室平章政事脱欢到西北的，其祖籍也是眉山县南拐村，据说是苏轼之后，来西北之前，家居南京处士巷。从时间上推，明洪武初年是公元1368年，到2010年是642年。苏龙与苏彪正好是同时期的人。我想，永登苏龙是否就是河北交河苏彪之兄？苏虎、苏凤兄弟又去了哪里？

此事还请宗长留心，能否发现一些证据。我翘首企盼。

苏裕民敬上 2010年11月26日

本会会长苏永祁著《小水石居文集·第二册·历览山川人文》，2011年2月由儒商出版社出版。永祁会长执笔勤勉，著述丰盈。该文集第一册已于2010年9月出版，此第二册共收入1959—2009年间发表的各类文章150余篇，并附“历年发表文章目录”。内容涵盖军事后勤、旅游散记、人物访谈、文物观赏、随笔杂录诸方面。

**明成化十四年(1478)生于嘉定，正德年间太学生，娶尚书龚弘之女，任叶县县丞，以规范马政、整治治安为民称道，晚年还乡不久嘉靖十九年(1540)歿，葬嘉定县马泾西。陇生两子，长子九河卒于父前，葬叶县月台，九河之子、孙亦葬月台，后来孙之冢移葬吴赵西地。苏陇次子九畴亦太学生，任江西省南城县主簿。九河之重孙可昌，于清初携妻董氏、子起元，从月台迁至湾赵村。《湾赵苏氏家乘》即以可昌为始迁祖，国干、国兴为第十一代。该谱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苏文祥之前三代、苏陇之后三代因暂无文字资料而留缺待考。**

中国青年报资深女编辑苏敏寄来其祖籍山东蓬莱塌地桥苏氏宗谱辈份排列二十字为：惠文良应亭，国九永长龄，世德开基远，培树芝兰生。并附其曾祖父苏长祥、祖父辈年龄辈、父辈世字辈、她德字辈、她下一辈开字辈、及最晚的基字辈共6代人的世系表。

苏满历时三月中国游

美国苏氏宗亲会副会长苏满女士，从2010年10月出席第八届世苏大会后，只身到香港、广州、深圳、中山、顺德、珠海、茶陵、炎陵、株洲、郑州、信阳、安阳、重庆、贵阳等地广泛访问宗亲，开展联谊，受到各地宗亲组织与个人的热情欢迎和接待，行程3个月。

各地联谊选登

该谱编委增印10本。他对上海苏氏联谊会表示支持，愿为苏家事业出力。几天后即捐会费一万元。

苏民赠谱

2月15日，在宁波海军工作的苏民宗亲，将由其伯父国干、国兴主修，他承办于2010年12月印出的《湾赵苏氏家乘》寄赠苏永祁，并附光盘。湾赵村为河南省叶县田庄乡千兵营行政村辖地，村民千余人中赵姓最多，清初来住的苏姓约占三分之一。该支祖辈相传为眉山三苏后裔，宋末有苏文祥从扬州迁嘉定，传六代有苏陇，从扬州迁嘉定，传六代有苏陇，

苏敏寄来蓬莱宗谱辈份排行

《人民日报》发文纪念华国锋诞辰90周年

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今年2月16日，是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华国锋同志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奉献了毕生精力。

一、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参加山西解放战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战斗

华国锋，原名苏铸，字成九，1921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制革工人家庭。学生时代，他就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1936年冬，绥远百灵庙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交城师生发起的演剧运动，筹集资金捐助绥远抗日将士。他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军事训练，动手试制武器，为直接参加对日武装斗争做准备。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耳闻目睹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和日军占领家乡的暴行，毅然投身抗日运动。为了表达做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的决心，1938年他改名为华国锋。就在这一年6月，他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他在山西汾阳担任牺盟会工作员、党小组长，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走村串户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同时领导群众与阎锡山顽固势力进行斗争。1939年12月，蒋介石、阎锡山发动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即抗敌决死纵队）的十二月事变后，华国锋同志回到家乡交城，先后担任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分区农民部部长，中共交城县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等职务，承担起发动群众、配合八路军主力消灭日伪军、顽军和抗日动员等重要任务。他深入到煤矿工人和农民、妇女、儿童中，通过创办业余夜校、组织抗日剧团，开展爱国教育，极大地激发了群众抗日热情，把各阶层人士都团结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为粉碎日伪军的经济封锁，他依靠群众，开展减租减息，除奸反霸，开展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解决粮食问题，并秘密向吕梁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物资。他带领精干的武工队到游击区、敌占区活动，运用地雷战等方式有效打击敌人，建立抗日政权。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为发展壮大当地抗日武装力量和开展抗日工作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国锋同志历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晋绥边区第八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阳曲县委书记、晋中区第一地委宣传部长等职。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的复杂形势下，他遵循党中央制定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指示，组织扩充和加强交城县武装力量，发展民兵武装，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蒋介石、阎锡山发动内战的阴谋，同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展坚决斗争。他积极组织民兵开展对阎锡山部队的认真细致的政治工作，吸引不少敌军士兵弃暗投明，加入到人民军队中来。他组织群众搞好生产，加强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了汾孝战役、开栅保卫战、黄崖战斗、古交战斗等。在指挥作战中，他采取武装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式消灭、瓦解敌军，取得显著成绩，被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作为经验推广。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精神，领导交城、阳曲等地的土地改革，深入到贫雇农中间，了解群众思想动态和切实需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并注意纠正土改过程中出现的“左”的偏差，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积极性。群众踊跃参军支前，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为解放古交、太原等城市提供了坚实后勤保障。华国锋同志为山西解放战争胜利和人民政权建立与巩固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湖南工作，为湖南建设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这一年，28岁的华国锋同志南下湖南。从这时到1971年，他长期在湖南工作。

1949年初，华国锋同志任晋中南下支队一地委宣传部部长，随军南下来到湖南省湘阴县，担任解放后第一任湘阴县委书记。刚解放的湘阴，百废待兴。华国锋同志沉着稳健开展工作。他指挥南下工作团和当地地下党组织的同志，

分赴全县各乡，放手发动群众，开展调查研究，迅速打开了局面，湘阴的支前、建政、剿匪、救灾、土改、生产等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不久，他调往湘潭工作，历任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专员公署专员，湘潭地委书记。当时正值党领导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他一边学习钻研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一边深入工厂、农村、街道调查研究。他结合湘潭地区实际，领导开展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认真总结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经验，在1955年召开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进行了介绍。1956年后，他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1958年后，他历任湖南省副省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务。在湖南省领导岗位上，他为全省多方面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华国锋同志重视抓农业生产，特别是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主持兴修了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在韶山灌区建设过程中，他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妥善安置拆迁移民，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搞好建设。韶山灌区工程成为湖南省首个灌溉百万亩农田的大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后，对当地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国锋同志十分支持发展杂交水稻。从1964年起，时任湖南安江农校教师的袁隆平同志在国内首次提出利用水稻杂种优势增加粮食产量即进行水稻杂交的设想，并着手进行研究。华国锋同志对袁隆平同志的研究非常支持和重视，请袁隆平同志在湖南省农业科学实验经验交流大会上发言，并将杂交水稻作为全省重点工作项目给以大力支持。调中央工作后，他仍然关心杂交水稻研究。华国锋同志的关心支持对促进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实现我国水稻生产重大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同志注意抓工业生产、交通建设。除致力于发展煤炭、钢铁等基础工业外，他积极支持发展地方工业。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湖南要建成工业省的指示，他组织力量抓重点项目建设和施工，其中包括30套小氮肥设备、10套制糖机、湘江氮肥厂、矿山冶金设备、汽车生产等项目。他大力提倡和支持社队企业发展，组织与兄弟省区协作，扶持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他领导了湘黔、枝柳铁路在湖南的会战等重点交通建设项目。这一系列努力，使原本基础薄弱的湖南工业生产得到了较大发展，交通建设呈现出崭新局面。

华国锋同志关注人民群众生活，努力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解放初期刚到湖南时，他就在湘阴领导建立了第一批农村卫生所，培训了湘阴第一代医生，充实发展了县人民医院。他满腔热情推广农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指示培训卫生技术人员，建立和发展医学院校。他特别重视消灭千百年来危害广大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亲自负责湖南省血防领导工作，主持修订全省消灭血吸虫病规划，研究建立各级血防领导机构和防治业务机构，下乡深入疫区调查研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在他直接领导下，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取得重大成就，旧社会“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一处处荒洲湖汊，逐步变成林茂粮丰、五业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华国锋同志善于做文化教育和统战工作。他热心与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交朋友，经常深入到他们中间听取意见，落实各项统战政策。他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摆脱旧文艺的影响，团结在党的周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文艺工作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向。他注意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他注重保护和发展具有湖南地方特色的湘剧、花鼓戏、祁剧、巴陵戏、皮影、木偶戏等地方剧种，同时强调对旧的文艺形式进行改造和革新，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新文艺。在他支持下，湖南文化艺术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依然得到一定发展。

华国锋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工作扎实，作风务实。“大跃进”中，面对虚报、浮夸等不良风气

和相互攀比、盲目追求高产的做法，他凭自己多年基层工作经验和深入各地实际了解到的情况，于1959年6月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谈了自己对当时形势的看法，说：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产量不可能那么高了。他实事求是反映问题的态度受到毛泽东同志肯定和赞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国锋同志受到冲击并被批斗。在周恩来同志支持和保护下，1967年他恢复工作，不久担任湖南省党政主要领导职务。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复杂环境下，他尽力排除多方面干扰，努力维持全省稳定和生产秩序，保护和解放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大力抓好农业、工业、财贸、文教等工作，使湖南经济避免了较大波动。

华国锋同志在湖南工作20余年，致力于新湖南建设，为改变湖南面貌、造福三湘人民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他以身作则，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细致认真，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创业，被毛泽东同志评价为“讲老实话，是老实人”。他重视经济建设，关心群众生活，对湖南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湖南这片土地和湖南各族人民怀有深厚感情，也受到湖南各族人民尊敬和爱戴。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困难局面中先后参与和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

1971年初，华国锋同志调中央工作。从这时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先是协助周恩来同志负责国务院有关工作；周恩来同志逝世后，他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环境下仍然得到一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1971年1月，华国锋同志调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之后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九一三事件”中，他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参与了处理林彪集团问题的工作，同年10月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在国务院工作中，他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对极左思潮加以纠正，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72年，他与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一起向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建议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化肥设备，并争取扩大对外引进规模，使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工作取得重大成就。在保障市场供应和物价稳定等方面，他做了大量工作。

1973年，华国锋同志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周恩来同志主抓农业工作。他强调推广农业科技和优良品种，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使全国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75年9月，他主持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对全国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作出规划。他强调科学种田的重要性，指示要全面发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对推动农业机械化、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同志十分重视计划生育工作。1973年7月，他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后，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方针，为控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作出了贡献。

1975年1月，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年2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确定为常务副总理之一。在主管政法和科学等方面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精神，在分管的部门解放了大批干部，适当安排了工作。他注重科学技术工作和高技术人才培养，并领导和支持高端国防项目研制攻关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逝世。2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他立即组织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研究实施了一系列抗震救灾措施。8月4日，他率中央慰问团赶赴唐山地震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慰问灾区群众，转达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鼓励灾区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在这之后，他又多次视察地震灾区，了解灾后居民住房生活等情况，调动各方面因素加快灾后重建步

伐。正确的领导，周密的部署，使抗震救灾工作迅速高效进行，在党和国家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对稳定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领导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党和人民面前，也摆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面前。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逐步为一部分干部落实政策。在他主持下，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批重大错案平反。

在稳定全国局势的同时，华国锋同志重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重新发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号召。他提出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多次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他支持经济理论界开展的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肯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应该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他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他认为，“一定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其中包括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经营管理经验，开展广泛的经济合作”。他还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1980年9月，华国锋同志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至1982年9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从十二大到十五大，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且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华国锋同志仍然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心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注意调查研究，遵守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他拥护党中央的领导，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华国锋同志一生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他勤于学习，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善于总结经验。他始终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事业工作。他作风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集思广益，注意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关心同志，爱护干部。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俭朴，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华国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将永载史册。他的崇高品格风范，将永远受到人民群众赞誉。

（原载2011年2月19日《人民日报》）

唐昭德将军开漳始祖道公之神，曰：淮苏开闽，惟公开漳，源衍闽乡，铃铎鸿富，韬略虧扬，丝纶载教，弓矢斯长，圣王柳营，试马松寨，启疆南蛮，衣被北庙，锡福穰穰，连登科甲。

漳州苏氏第一祖居地在云霄火田，唐贞元二年（786年），州治迁设九龙江平原，苏氏后裔随州治迁徙，蕃衍龙溪、漳浦二县。据《漳州府志》记载，北宋初期，有6位龙溪籍（苏颖、苏逢、苏迪、苏传、苏绍、苏良翰）1位漳浦籍（苏叔和）及苏氏后裔进士及第。

二、《漳州府志》兵纪卷苏道记载

漳州修志始于宋，宋代共修四志。元代漳州没有修志。明代漳州修有三志，清代共修四志。虽然宋、明诸志多已失传，但上都有承续关系。清光绪三年之沉定均等纂修《漳州府志》，是仅有几部志书中比较完整的一部。清光绪版《漳州府志》共51卷，分述漳州府和龙溪、漳浦、长泰、南靖、平和、诏安、海澄、云霄八县及漳州、镇海二军事。

有关苏姓人闽开漳始祖公之记载，见于卷22兵纪一。在名录里，随陈政、陈元光入闽开漳“诸将”，有132人64个姓，形成众多的漳州姓氏开基祖。

三、《寿祝杂款钞录》道公祭文

手写本《寿祝杂款钞录》写于民国甲寅端午，现保存在龙海太江村老苏汉水家，作者“小古楼”即苏汉水之祖父。这是我在2006年1月到各村社搜集旧族谱时，意外发现的。

这本《寿祝杂款钞录》共39页，前27页有21篇祭文。其中有“青礁始祖冬至节祝文”、“三都始祖墓祭祝文”、“虎溪祖庙春秋祭祝文”、“配享列祖祝文”、“太江大宗祭冬至节祝文”、“愚翁讳日祝文”、“愚翁祖妣讳日祝文”、“清明寿峰墓祭祝文”、“小宗三房祖考妣同讳节祝文”、“侍婆讳日祝文”、“哲甫祖上墓祝文”。

在这些祭文里，青礁、虎溪和太江世系排列非常清楚，不逊于一部老族谱。特别是开头第一页“漳州北庙祭开漳始祖道公祝文”，尤为珍贵。这篇“道公祝文”足以说明，在民国三年以前，虎渡和太江苏氏曾前往漳州府城陈圣王庙，祭祀开漳始祖道公神灵，亦即虎渡和太江苏氏认道公为开漳始祖。

四、唐高宗皇帝诏令及陈元光疏

陈政、陈元光入闽开漳一事，没有记载在新旧唐书里。但在《漳州府志》卷四十二里，有唐高宗皇帝诏令《召陈政故绥安县地》，以及陈元光《请建州县表》和《谢准请表》两篇奏疏，均可证明唐初陈政、陈元光入闽开辟漳州的历史事实。并且，在《全唐诗》还保存着陈元光诗三首，和他的部将许天正诗一首。这四首诗作，也可作为佐证。

五、陈政、陈元光简介

2007年10月，由漳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审，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漳州姓氏》第67页，有陈政、陈元光简介，现摘录如下：

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陈政奉朝廷命，率兵将镇泉潮间故绥安地，平“蛮獠啸乱”。陈政，克耕第三子，字一民，号素轩。唐高宗朝，拜左玉卫翊府左郎将。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卒。

子元光（657—711年），字廷炬，号龙湖。奉诏继任岭南行军总管，平定啸乱。于永淳二年（683年）奏请置漳州、籍漳浦、怀恩二县。垂拱二年（686年）奏准建置漳州及漳浦县，设治所于漳江之北。

陈政、陈元光父子率中原八十多姓氏子弟兵将士驻守漳州，开发漳州。陈元光征戍殉职后，追封颍川侯，以后历代帝王对其多有敕封，民间尊称为开漳圣王。

陈政暨夫人司空氏合葬于云霄县将军山麓。南宋嘉熙四年（1240年）重修，1985年清理重建。1991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唐景云二年（711年）十一月，陈元光讨寇贼阵亡于云霄岳山，并葬于绥安溪大峙原。贞元二年（786年），元光曾孙陈模徙州治于龙溪，遂迁葬元光墓于今芗城区浦南镇梧浦村石鼓山。陈元光墓已列为漳州市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由漳州陈氏宗亲会扩建为“开漳圣王陈元光陵园”。

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韩 钢

转自 2011年第2期《炎黄春秋》杂志

继毛泽东之后，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四年零八个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为权力核心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褒有贬，却贬多于褒。

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著述几乎无一不以此为基调；一些著述还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负面评价：“阻挠和拖延恢复邓小平工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洋跃进’”，等等。

很长时间里，笔者相信“一正四负”的评价。近些年来阅读更多史料和口述回忆后，笔者发现：“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去世后，官方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经官方审定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是说“有功”，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注1

抛开意识形态色彩不说，至少在事实上，这次评价还算客观。至于推行“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等等说法，新华社的生平未置一词。这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方改变了结论。

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评价。但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粉碎“四人帮”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坊间说法甚多，但不少属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在缺乏更多公开文献的情况下，就决策层而言，三位直接当事人——即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的口述最值得重视。

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起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注2

吴德在自述里说：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这个情节，吴德不是当事人，大概他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的，因为吴在自述里说过，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注3

1999年3月9日，张根生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华告诉张：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

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注4

另一位重要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的口述和回忆。只有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叶剑英之侄）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他和刘诗昆（叶剑英前女婿）向王震和熊向晖讲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注5叶选基不是当事人，想必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他再告诉熊向晖和王震，熊向晖又告诉了熊蕾。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叙述，也许算是一个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2007年出版的《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4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注6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熊蕾披露的叶选基的叙述，以及《叶剑英年谱》的记载，对事情的时间、情节的说法不尽相同，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华先找叶帅，通过叶帅找陈锡联，陈锡联通知吴忠去执行。叶选基下了命令，要吴忠一切行动听吴德同志指挥。迟群、谢静宜、金祖敏也是吴德抓的。注7

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逝世前后，叶剑英在党内元老和军方将领之间有过私下议论，可以说早有酝酿和考虑。注8当华委托李转告此意后，叶剑英与华国锋一拍即合。叶剑英以其军方元老的资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凭借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政军各界具有极高威望。他同华联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堪称中流砥柱。

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逝世前后，叶剑英在党内元老和军方将领之间有过私下议论，可以说早有酝酿和考虑。注8当华委托李转告此意后，叶剑英与华国锋一拍即合。叶剑英以其军方元老的资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凭借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政军各界具有极高威望。他同华联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堪称中流砥柱。

毛去世后，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一共16位，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刘伯承因病重、吴桂贤因被疑为江青的追随者不曾与闻此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都是华国锋先后分别商谈或打招呼的（据吴德说，倪志福是他个别打的招呼）。这些政治局成员都赞成或基本赞成华的提议，汪、吴、陈（锡联）、苏的态度尤其坚决和积极。注9

解决“四人帮”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等人商谈的。据华国锋回忆，他“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东兴谈话，“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静宜、迟群的煽动上街闹事”。注10

2000年5月20日，《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访问华国锋，华说得更具体：（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参加，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9月26日，华在国务院小礼堂，向李先念、吴德转告了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考虑。李、吴均表示支持。三人还分析了形势以及解决“四人帮”的时间。注11《叶剑英年谱》记载，华、叶两人有三次密谈，时间是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

吴德在自述里说：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这个情节，吴德不是当事人，大概他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的，因为吴在自述里说过，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注3

1999年3月9日，张根生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华告诉张：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

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注12

耿飚的回忆，也详述了华国锋指示他控制电台、电视台的经过。注13

10月6日晚8点，华国锋、叶剑英主持，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飚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后，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为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邓闲居西山时，好几位政治局成员曾前往探望。前引吴德口述就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明确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注14苏振华、倪志福也曾去西山向邓汇报上海的工作情况。苏对邓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全国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邓说：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国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去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苏、倪连忙表示：你要出来就不是当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早有评价，我们都拥护你。注15

政治局成员看望邓小平，不会是个人行为，没有高层决定恢复邓的工作的背景，断不会作出这种表示的。

1977年1月14日，李鑫向中央理论学习组注16传达华国锋在1月6日政治局会议的讲话：“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来工作的条件，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头脑要清楚。”注17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也告诉与会者：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这些材料表明，华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而是早已决定恢复邓的工作。至迟到1977年初，邓小平的重新复出只是时间问题。

华和高层的打算，是过一段时间再恢复邓的工作，而不是马上让邓出来。但这不是“拖延”，而是华和高层的一种策略考虑。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泽东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1975年，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毛的遗孀和毛倚重的几个儿子，严格说来，的确是一次非程序的强力行动，不能不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愿，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和高层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华国锋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注18事实上，邓正式复出之前已经参与最高层决策，（下转第7版）

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注19 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注20 极力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注21 可见，经过一个过程再恢复邓的工作，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意思，而是高层的共识。

出于策略的考虑，华和高层一方面暗中准备邓的复出，另一方面则公开维持了“批邓”的口号。事后看来，华和高层或许有些过虑，对人心向背估计不足，但绝非“拖延”，更不是要“坚持‘批邓’”、“蓄意‘阻挠’邓复出。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国锋的公开讲话只提过一次“批邓”。1976年12月25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说“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批邓另搞一套”。这大概是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及“批邓”。至于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见“批邓”的字眼。原因不难解释：1977年1月中央已经决定解决邓的问题。既然要恢复邓的工作，当然不会再提“批邓”。所以，说是继续“批邓”，其实不长，三个月而已，而且没有什么实际动作。后来对华的指责，是把事实放大了，说重了。

由于中共内外有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华和高层打算1977年1月召开一次中央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向高级干部交底。李鑫后来说：“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注22 阴差阳错的是，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不然的话，还在1977年1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1977年春天，呼吁邓复出的声音更加强烈，已经形成一种舆论氛围。3月份，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向与会者解释：“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注23 不然的话，还在1977年1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1977年春天，呼吁邓复出的声音更加强烈，已经形成一种舆论氛围。3月份，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向与会者解释：“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注23 不然的话，还在1977年1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就在这次会议上，华宣布：“‘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注24 事实上，邓正式复出之前已经参与最高层决策。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华国锋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注25 事实上，邓正式复出之前已经参与最高层决策，（下转第7版）

(上接第6版)华国锋后来说过：“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注30

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邓的复出向全党“打招呼”。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所有职务，正式复出。

“两个凡是”的由来

华国锋最受诟病的，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华当然脱不了干系。但事情也不像长期流行的一些说法那么简单。

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已经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这些动向，华显然不满，但态度却比较温和容忍。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注31华和高层不是不解决两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层设想的步骤解决，以免干扰高层预设的“大局”，其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和高层的政治底线。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文件指的是《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大概是汪落实华国锋“要引导”指示的第一个动作。

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布置任务。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李鑫向理论组作了传达。“小范围”就是前述高层准备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华国锋要在会上讲话，要求准备一个讲话提纲；学大庆会议则是将在4月份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华也要讲话，要起草一个讲话稿。李鑫还强调要批小道消息，狠驳分裂中央的言论。所谓“小道消息”、“分裂言论”，指的是社会上关于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舆论。社论稿的起草因于此搁置下来，理论组转而起草华的讲话提纲和讲话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讲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注32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

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注33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汪东兴显然此前看过已经起草的稿子。

理论组再次回过头来修改社论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注34“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后半句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鑫将稿子报送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东兴再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请耿飚注35、朱穆之注36、李鑫、华楠注37、王殊注38同志阅办。”但只有李鑫在这个批件上画圈，没有听取其他几位的意见。注39据李鑫后来的检讨，是他没有同宣传口和两报一刊的负责人商量，就直接报汪东兴审批了。注40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上述经过说明，这个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华国锋说没说过“凡是”呢？说过，但与这个经典表述的背景或词句并不一样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谈到揭批“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注41在这里华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及毛泽东。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注42这个讲话，就是前述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那个稿子。讲话里“两个凡是”的表述，与两报一刊社论不完全一样，主要是第二句不同。据华国锋说，讲话稿和社论稿分别经政治局讨论或传阅同意。注43

不久，华就感觉他的讲话有毛病：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注44值得注意的是，华并非“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后才感觉有毛病的。几乎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过“两个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可以说，作为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实际已经终结。说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不是事实。至于“文革”之后维护毛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心理，很难也不应该以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来概括。

有一点需要澄清，“两个凡是”不管有什么真实指向，至少没有反对邓小平复出的意思。最早质疑“两个凡是”意在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是邓力群。据邓力群回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

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务院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注45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7年2月，王震去看望邓小平。邓表示了对“两个凡是”提法的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列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注46王震看望邓小平，很可能就是去反映“两个凡是”问题的。

邓力群显然有误解。如前所述，华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不可能发表一篇社论去阻挠邓的复出。真是如此，如何解释社论发表之后华还要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呢？还有一种说法：提出“两个凡是”是为了继续“批邓”。这更无从谈起。前面已述，年初高层就停止了“批邓”，怎么会用“两个凡是”去维持一个已经废止的口号？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但是说到具体情形，几乎所有的著述都是讲的汪东兴；至于对华国锋，只有简单的政治结论，事实则含糊不清。

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连开九次会议批评华国锋。胡耀邦在发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总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注47华国锋主政时期，胡耀邦是中组部部长，又曾经与华共事，对华比较了解，他的评论应该有分量。胡耀邦说得很清楚，华没有反对解放哪个老干部，只是“不积极，不热情”。“不积极，不热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挠”当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一些史料和口述，还反映出华的另一种状况。以胡耀邦本人为例。1976年“批邓”运动中，胡耀邦受到严厉批判，已经被边缘化，在家中赋闲。胡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汪东兴曾找他谈话。注48谈什么，胡没有说。据胡耀邦女儿满妹的著述，华找胡耀邦谈的是请他出来工作的事情。满妹回忆，抓捕“四人帮”后，经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胡到中央党校工作。胡婉拒了，华登门无果。1977年2月26日，华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的，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胡仍不从。后来是叶剑英出面，胡才答应。注49

胡绩伟的出山，也是华国锋亲自出面。胡绩伟“文革”前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中作为“走资派”被打倒，1975年，胡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没有安排任何职务。1976年10月底，经人举荐，华专门找胡绩伟谈调回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胜任为由推辞。据胡回忆：“华国锋笑着对我说：‘你能力差？你难道还不如那个草包总编辑（指《人民日报》前主要负责人——引者注）高明？’华国锋是老实人，说的是真心话，他的激将法对我还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气地说：‘当然，我比他高明！’华说：‘他干得了，你干不了？’我无言以对。华说：‘好，中央决定让你回去，明天就去报社上班！’我只好服从。”注50

有一点需要澄清，“两个凡是”不管有什么真实指向，至少没有反对邓小平复出的意思。最早质疑“两个凡是”意在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是邓力群。据邓力群回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

张爱萍的复出，同样是华国锋亲自召见谈话的。张爱萍“文革”前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文革”发动之后不久，1967年即被逮捕入狱，1972年4月方出狱。1975年初期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1976年“批邓”运动中再次被打倒。据张爱萍之子张胜记述，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召见张爱萍，告诉他：专委注51现在由他来接。华和叶帅商量过了，相信张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华还说，通过1975年，他就看出张爱萍来了。张胜还记述了华对张爱萍一番颇为坦诚的谈话。注52

胡耀邦、胡绩伟、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胡耀邦、张爱萍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以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阻挠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积极，不热情”。

粉碎“四人帮”之后，调整了一批省部级领导班子，一些“文革”中被打败的资深官员即“老干部”或被启用，或被重用，同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不会没有关系。在解放老干部的问题上，华国锋未见得都“不积极，不热情”，他曾对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说：“为什么有些老同志不出来？为何不能互相谅解？习仲勋、宋任穷出来不是很好吗？周惠要到内蒙古去。有些老同志靠多年，为何不让出来？怕举逸民。这些都是无产阶级的逸民。”注53

平反冤假错案，华国锋也不是毫

无作为。据图们、祝东力的著述，内蒙古最大的冤案“内人党案”的复查平反报告，就是华国锋亲自修改和审定的。报告上送四天，中共中央就批复正式平反，中央的批示也是华国锋亲拟的。据曾志的回忆，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的案例座谈会，是华国锋批准的。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文革”的重大冤案之一，由于“钦点”而极难复查平反。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曾试图解决，因阻力太大无果而终。胡耀邦上任中组部后，即提出复查此案的请求。主管专案的副主席汪东兴再下“禁令”：“六十一人”的问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注54胡耀邦坚持复查，并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也得到华国锋支持。华国锋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注55胡耀邦当年说过：华主席对我说，看来六十个人的问题是可以复查的。让我们先搞出材料，一步一步酝酿。“六十一人案”终获平反，首功当推胡耀邦，一些元老和中组部的干部也功不可没，同样也不能否定华国锋的作用。

华国锋对上述两桩重大冤案的处理，固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是，简单地以“拖延和阻挠”来判定华国锋对解决冤假错案的态度，恐怕也不公道。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也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一大错误。应当承认，华维持了这些口号，这表明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脱出毛晚年意识形态的窠臼。但是通观华的政治实践，事情不像人们批评的那么简单。

华的方略是“抓纲治国”。“纲”是毛泽东的语言，指的是“阶级斗争”。但是细察华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称：“我们当前的主题，当前的纲，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帮’。”注56华“抓纲”的目的在于“治国”，他沿用毛泽东的话，特别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批‘四人帮’中要贯彻主席说的‘抓革命，促生产’，过去‘四人帮’谁说‘抓生产’，他们就说‘唯生产力论’……我们现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产’。”注57虽然依旧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套路，但重心在“促生产”，毕竟与

“只革命、不生产”或“重革命、轻生产”不同。对国民生活，华国锋也相当关注。甫一粉碎“四人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华要求“把暂时的困难渡过去，而且要把群众生活搞得更好”，“注意群众生活要搞好，市场一定要搞得更好”，嘱咐“明年市场要安排好，元旦、春节要安排好一点”，“轻工业这两个月不要放松”；还提议明年要解决工资问题。注58

“文革”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主题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华否定了“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粗暴批判，正面肯定了发展生产力：“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注59语言虽然充满意识形态色彩，但透露出来“抓生产、抓生活”的意向。华主政两年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主题都是计划、生产、科技、教育、财贸、引进等业务，比如：1976年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3月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之一是商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4月到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1月到12月全国计划会议；1978年2月到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之一是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3月全国科学大会，4月到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6月到7月全国财贸学大庆大寨会议，7月到9月国务院务虚会。

按照官方叙述，“重点转移”是“文革”之后的历史性转折，而这个战略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已有著述还把它说成是与“两个凡是”较量的结果，若隐若现地划出一条华国锋与邓小平对立的线索。事实并非如此。

问题是是从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时间提出的，追溯起来，最早还可以说是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报告。华和高层的设想，是揭批“四人帮”的清查运动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至于深入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是长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注60即揭批“四人帮”分为清查和理论批判两个方面，清查运动大抵在1977年内告一段落，或者再稍微延长一段时间；理论批判则作为长期任务进行。

十一大后，协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从军队工作的角度考虑早些结束揭批运动，尽快将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8月23日，复出才一个月，邓小平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透露了这个意思：“华主席提出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而且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这总也有一个时间限制嘛，这就是说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邓没有直接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还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肯定的”，但强调的重心是“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某个部门总有某个部门的纲”。注61或许应该更多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理解邓的想法，其意图可能是以局部替代整体的方式，淡化和置换“阶级斗争”的“纲”。

其实华国锋也在考虑结束揭批运动。1977年12月，他要求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结束清查运动。有人要求把清查运动的时间延长一点，华没有同意，要求还是按照十一大提法。注62不知何故，高层并未宣布结束运动，倒是提出“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注63“底”在哪里？时过九个月，邓小平旧话重提。1978年9月，邓在东北同沈阳军区负责人谈话，透出对运动过久的不满：对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运动不能总这么搞下去吧？运动搞得时间过长就厌倦了。有的不疼不痒，没个目的，

（下转第8版）

华国锋，是30多年前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2008年夏，华国锋在北京辞世，享年87岁，中共中央给予他高度评价。今年2月16日华国锋90岁冥寿前夕，大公报记者探访了山西交城，亲身感受到家乡父老对他的深深怀念。在那里，一座墓地正在修建中，准备厚葬这位昔日的中国最高领导人。

华国锋1921年2月出生于山西吕梁市交城县，当地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老歌：“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不浇那个交城它浇了文水”。中国历来有叶落归根的传统，华国锋也不例外，生前曾交代亲人，他过世后“想回家乡”。为此，家乡人民为这位游子在故土修建了“华国锋之墓”。

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华国锋在北京逝世。中共中央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他的骨灰暂时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华国锋遗愿是：“我回卦山吧，那里树多，清静。小时候在那儿，打游击也在那儿……”据此，中央批准“华国锋同志骨灰回故乡安放。”

当年9月22日，华国锋之子苏华、苏斌以及秘书曹万贵等，来到交城县选址，提出了选择墓地的“四不原则”：不佔用耕地、不与民争地、不破坏环境、不损坏古迹。最后，他们选中离县城不远的卦山南麓一处荒山石坡。此后，交县委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一致认为，“华国锋同志骨灰安放到家乡，既体现了华国锋同志对家乡的赤子深情，也是家乡人民的心愿，更有利于人民群众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2009年4月8日上午，山西省、吕梁市、交城县等各级领导及干部群众、学生代表300多人与华国锋亲属一道，在卦山南麓举行了“华国锋同志骨灰安放工程”奠基仪式。这里紧连规划中的卦山公园，属于卦山生态园的一部分。卦山公园将由吕梁英雄纪念广场、交城县晋绥革命历史纪念馆、交城县文物博物馆等几部分组成。

华国锋骨灰安放点采用的是与卦山风景名胜相应的建筑风格，匠心独运，也体现了与生态、环境、人文、自然和谐统一的设计理念，其肃穆庄重，也较好地与卦山厚重的历史文化氛围有机地融合。墓碑正面镌刻金色隶书大字“华国锋之墓”，右下方是华国锋的生卒年份(1921—2008)，风格简朴，没有修饰，没有歌功颂德的辞章，也与华国锋低调、谦和的品格和生活态度相符。墓碑底座的围沿上有梅花图案的浮雕，象征华老高洁虚怀、超脱豁达的品格和境界。

“华老的陵墓建成后，将为交城人民增添一处休闲锻炼的好去处，与吕梁英雄纪念广场、交城县晋绥革命历史纪念馆、交城县文物博物馆等一起，成为人们瞻仰、参观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工程项目负责人对记者说。

有游客对记者说，“卦山将由此闻名，成为一处旅游胜地。”

父老乡亲感自豪

墓园虽然还未竣工，来此瞻仰和游玩的人却已经不少。

一位姓田的老人用交城方言对记者说：“华

(上接第7版)搞形式主义。注64

邓小平回京后，很可能与华国锋作过沟通。10月9日，华同“毛著编办”几位负责人注65谈话，提到邓小平经过沈阳时，李德生反映基层群众对运动有些厌恶。华还说，邓在东北提出了军队结束运动的五条标准。注66华这时提出的问题与邓大致相同：现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从全党全国全军来看，怎样估计分析，什么时候可以告一段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个底怎么算？在他看来，从理论上批林彪、“四人帮”还可以搞若干年，但这不好把全党全军全民全体卷入到里边来，多数人怎么办？应该转向新的任务、奋斗目标。华很清楚，加快经济建设，加快四个现代化，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事”。注67华国锋考虑，就在这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结束运动。注68迄今为止，这是所见最早提出结束揭批运动、把“转向新的任务”作为会议议题的材料。高层就此征求了各地负责人的意见，中央常委商议了此事，政治局开会讨论做出了决定。会议前夕，1978年11月5日，华国锋同起草文件的“秀才”班子谈话，告诉他们：“明确明年一月一日就转。坚决转。征求地方同志意见，常委议了，政治局开会也谈了，大家都一致赞成，再不转，工作就耽误了……基于这个分析，提出重点转移。”注69到1978年冬，在“重点转移”的问题上，华与邓没有根本性分歧。

华国锋唯一有些顾虑的，是如何提政治口号。

山西交城迎华国锋叶落归根

(转自2011.2.21《大公报》记者 唐瑜)

老是好人啊！这是我们交城人民的骄傲，也是我们山西人民的骄傲，是伟人啊！我们家乡以他为自豪。老人家逝世后，能回归故里，安息到卦山，也是家乡人民的荣幸！我们很高兴，支持！”

旁边的几位老人也凑了过来，一位年长的抢着说：“知道不？这卦山早前叫龙山，后来发现这个山形像八卦，才称为卦山。卦山共有九座山峰汇集在一起，八座都无头，唯有这座山峰有头。这块墓地好像是老天爷专门给华老留的，华老能安葬到这里，是他的命好，好人有好报啊！”

晋书画院院长马长亮是与交城相邻的祁县人，对华国锋有深厚的感情，曾写过厚厚一本歌颂诗联，他一句一句念给记者听，动情处眼里噙满泪花。马长亮还邀请记者到他家去做客，搬出珍藏的几千份记载华国锋生平的报纸、杂志、画报、书籍、图片、照片给记者看。那些资料堆了整整一大屋子，令记者都看呆了。马长亮曾多次到北京看望华国锋，合影照就有好几本。他指一张合影说：“这是我们给华老过生日照的。华老没有一点架子，待人很亲切，就像自家爷爷。他跟我们拉家乡话，没有一点距离感。”

“为了表达对华老的敬爱，我准备出资在华老的墓园里修建一座6米宽、8.8米高的蓝田玉八角亭，里面还要供奉一座华老的玉石雕像。玉，是纯洁高贵的象征，只有玉石才能与华老的品格相匹配！”

厂商自办资料展

丁保洲当年怀着“建设华主席家乡”的热情，从河南南阳来到山西交城工作。经过多年摸爬滚打，他业有所成，在县城建了一座玉制品加工厂。出于对华国锋的深厚感情，他也曾多次进京登门拜访。经过多年的搜集、整理，在华国锋逝世一周年之际，丁保洲在自己的厂区办起了“华国锋资料展”。

记者慕名来到展厅，只见都是反映华国锋在各个历史时期活动的报纸、画报、图片，以及华国锋的文献、题词、书法作品，还有华国锋与父老乡亲的合影等等，可谓应有尽有。这些资料都一律用镜框装帧起来，墙上悬挂的、地上摆放的、柜里陈列的，加起来整整布置了三大间展厅。

丁保洲指一幅“艺无止境”书法介绍说：“这是2007年，华老在百忙中为我题写的，是我最宝贵的珍藏！”他的夫人说：“为了收藏华老的资料，他已经花去40多万元。”

60多岁的交城县志办原主任田瑞是“华国锋骨灰安放工程”项目的顾问之一。他对记者说：“我们家乡人对华老的感情很深，都很敬重他。省市县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正在认真地抓落实，争取早日把陵墓修好，迎请华老骨灰回家，完成他老人家生前的遗愿。”田瑞还拿出一幅卫星拍摄的交城县地图，指点说：“华老的墓地就选在这儿——县城西北1公里的卦山南麓山坡上，墓穴就在这儿——是几座山峰的交汇处。墓的位置和他的出生地、少年时期的生活地

都在一条直线上。很巧吧？”

华国锋没有故居

华国锋是皮匠家庭出身，他出生和小时候生活的房子都是父母母亲租住的。据说，当年主政时，有人想把华国锋小时候住过的房子当其故居，但他本人不同意，说那本来就是房东家的，怎么可以去侵占呢？不要搞形式主义，那样会害死人的！

既然华国锋在当地没有故居，记者只好去走访他哥哥家了。华国锋就兄弟俩，哥哥叫苏鉅。费了很大功夫，记者才打听到“华主席哥哥家”在交城县南街胡家巷11号。

记者见到一位叫苏乡林的人。领路的老乡介绍：“华主席的哥哥早就不在了，这是华主席的侄儿。”苏乡林，苏鉅之子，1950年生，曾任交城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其妻孙润桃曾供职交城县供销社，夫妻俩现都已退休在家。

这是两间坐南朝北的木质结构的老式瓦房，房子已经陈旧，浅红色的屋檐木檩上还挂着蜘蛛网。华国锋参加革命后仅有的几次回家，也就是回到这里。屋里家具摆设也十分简陋，一台彩电还只是14吋的。听说记者是想来看“华国锋故居”时，苏乡林夫妇很感动，客气地把我们让进屋。

主人把我们让到靠床而放的饭桌前坐下——这也就是这个家里会客的地方。据说华国锋1991年回家时，就曾在这张桌子上与亲属们一起吃过一顿饭。苏乡林告诉记者：

“我叔叔在家里的名字叫苏铸。他和家父苏鉅是亲兄弟俩。我们的爷爷名字叫苏清惠，1874年出生，14岁时来到县城一家皮革作坊做工。后来娶了掌柜的女儿——这就是我奶奶。因为我爷爷善于经营，掌柜的就将生意交给他打理。爷爷生意越做越大，家境渐渐殷实，所以我的父亲和叔叔早年都受到过较好的中等教育。1938年，叔叔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化名华国锋，取意于‘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直到1949年3月交城解放，家里才知道‘华国锋’就是‘苏铸’……

“解放后，叔叔只回过三次老家。第一次是1958年他担任湖南省副省长时到西安开全国财贸工作会议，顺道回家来看望年迈的母亲，住了10来天。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叔叔工作性质的特殊，我奶奶去世时他都没有回来见上最后一面。第二次是1991年8月底，叔叔回到交城住了近一个星期，到旧居和曾经打过游击的地方感受家乡的气息。那次就是坐在这个位置和家里人一起吃了家常饭。第三次是1995年，叔叔偕婶婶最后一次回交城，再次看了看他年轻时参加革命的一些地方……家乡人民的热情接待，让他的心里很不安，为了不给地方上添麻烦，此后就再没有回来过……”

采访结束时，苏乡林夫妇依依不舍地送出院门。走出很远，这对老夫妇还在向我们挥手。

华国锋虽然没有故居，但他出自交城，待墓园建成后，其骨灰再回到这片生他养他的热土安息，其人生便画完了一个圆。他的事业源于卦山——年轻时在这里打游击、干革命，逝世后又回到这里长眠，这也许是他的某种机缘吧。

1970年6月，当时的湖南省革委会在常德召开了“湖南省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怀化地区送去参展的就是“杂交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这次展览，让项目负责人袁隆平心怀忐忑。研究进行了6年，数千次的杂交试验，结果都不理想。他能有什么经验拿出去交流呢？也正因于此，“水稻杂交无优势”的论断越来越被人们相信，对袁隆平的质疑不绝于耳。

没想到，那次会上，时任湖南省革委会代主任的华国锋把袁隆平请上主席台就座和发言，公开表示了对杂交水稻研究的支持。

会后，华国锋还专门找袁隆平谈话，鼓励他说：周恩来总理经常过问杂交水稻科研的事，希望能够继续研究下去。要将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众中去搞，广泛发动群众性科技力量，合力把它搞成功。另一方面，华国锋向湖南省有关部门吹风，要求他们对杂交水稻研究大力支持。

1971年初，国家科委和农业部决定组织杂交水稻的全国性协作攻关，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袁隆平的研究升级成为了国家行动。

1973年，袁隆平宣告我国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基本成功。

1975年10月，在全国杂交水稻第四次科研协作会上，湖南省农科院提出了要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种植。在“文革”尚未结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中央的重视和支持，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

12月中旬，主管杂交水稻研究的湖南省农科院副院长陈洪新进京找农业部领导汇报。结果在农业部招待所住了三天，等到的回答都是“领导很忙，请等候”。

陈洪新心急如焚。见不到农业部领导，他干脆直接上报国务院。陈洪新凭着自己和时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华国锋的战友、同事关系，陈洪新写了一封满满四页的汇报信，信封上写明“华国锋同志亲收”，寄了出去。

两天后，国务院办公厅的电话打到了招待所陈洪新的房间：下午三点华副总理听汇报。当天下午，一辆小车把陈洪新接进了中南海。

听完汇报，华国锋当即拍板：第一，中央拿出150万元人民币支持杂交水稻推广，给广东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种子；第二，由农业部主持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

第二年，杂交水稻遍神州。全国推广杂交水稻208万亩，增产幅度普遍在20%以上。中国的粮食产量实现了一次飞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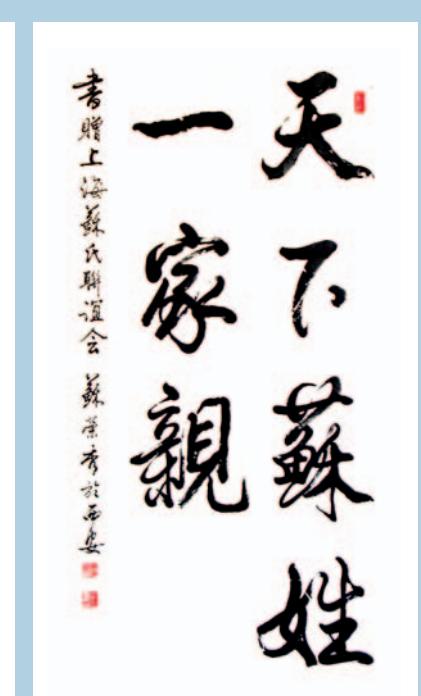
从1976年大面积推广至今，我国累计推广种植杂交水稻60亿亩，累计增产6000亿公斤，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7000万人。而时至今日，日本于1968年完成的杂交水稻“三系”配套也没有应用于生产。

编者注：摘自2011年2月21日《报刊文摘》，原题《一封神秘的“北京公函”》，刊《北京日报》，作者董少东。
(苏永祁推荐)



九龙戏水图(国画)

香港 苏章斐



天下苏姓一家亲(书法)

陕西 苏荣秀

纪
念
华
国
锋
同
志
诞
辰
九
十
周
年